




21 世纪高等院校课程教材

21 SHIJI GAODENG YUANXIAO KECHENG JIAOCAI

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

XIFANG MAKESI ZHUYI JIAOCHENG

裴德海 编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21 世纪高等院校课程教材

21 SHIJI GAODENG YUANXIAO KECHENG JIAOCAI

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

XIFANG MAKESI ZHUYI JIAOCHENG

裴德海 编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 / 裴德海编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12

ISBN 978 - 7 - 5336 - 4272 - 3

I. 西… II. 裴… III. 马克思主义—西方国家—教材
IV. 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01227号

责任编辑: 陈龙银 黎丽

特约编辑: 贾兴权

装帧设计: 心妍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邮 编: 230063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安徽省瑞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 mm×960 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70 000

版 次: 2007年8月第2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定 价: 26.0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2823297 2846176

序 言

林 源

现代社会历经数百年“理性化”的发展,新旧世纪之交的人类正面对着现代性的难题。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理应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性地反思人类的生存现状和历史。在对人类生存规范基础的先行澄明基础上,依照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问题意识和针对原本批判的理论逻辑,着眼于现代性两难的现实,努力发展一种既内含马克思理论的批判精神,又带有指向人类自由、解放实践倾向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便是当代学者的历史责任。基于此,有效地理解和解答亦已存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和现象,对于当下的中国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总体上的称谓。它并非专指一个具有完整思想体系的统一学说,而仅仅是表征着这样一个既具有某种共同理论基调,又色彩斑斓、内容庞杂的理论运动:上世纪20年代,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而西欧无产阶级革命遭到挫折后,一些西方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和理论家抛弃那种抽象的经济决定论,积极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的能动作用,这首先是对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的一种理论反叛;特别是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主义崛起后,这种强调主体性的哲学理论倾向在30年代突现为一种以新人本主义为本质的文化哲学;而在面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框架的建构,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诸种波折的特定背景下,这种思潮在理论上加强了与西方现代哲学的“融合”,一方面在其自身逻辑中建构出科学主义的解释学,另一方面开始全面转向对现代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企图寻找不同于传统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另一条“新道路”。显然,“西方”有地域上的含义,但并不归结为一种地域性的表征。因为它不完全包括西方世界中的所有学派(例如“欧洲共产主义”),更不同于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当作研究对象,并不一定赞同立场、观点、方法的“马克思学”。“西方”特指那种在共同的理论框架下同“正统的”相对立的所谓“另一条理论道路”的社会思潮。虽然“西方”是一种作为有着内在理论逻辑结构的多元化哲学思潮,但我们透过纷乱杂多的理论表象,还是可以把握其一般理

论特点的。首先，“西方”反对诠释马克思学说中的意识形态化和官方哲学构架，但仍然自我标榜为真正的。其次，“西方”是在哲学中以反传统的标新立异为形式特征的。所以，“西方”的发展总是呈现出某种“异端性”和多元化倾向，一般而论，它的生存是靠将自己维系在某种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和哲学流派上得以存在和发展，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实波动而沉浮，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较强的变异性和浮动性。

如果我们以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为分界线，可以把国外马克思主义迄今为止的演进历程分为两大阶段，即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一般说来，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为基本内涵，对它的界定不会产生很大的歧义；而进入20世纪后，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深刻的分化，如果我们又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又可划分为两大时期：战前是马克思主义分化的初期，战后则是分化的充分展开和马克思主义多样化的时期。具体来说，战前主要有三种马克思主义：①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②列宁主义及其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③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为代表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即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战后，西方国家曾一度掀起了“马克思热”，其研究的派别迅速增加，主要有：①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②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③西方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④东欧新马克思主义；⑤欧洲共产党人的“欧洲共产主义”；⑥北欧社会民主党人的“民主社会主义”；等等。

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并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是对20世纪初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事件所提出的问题的一份答卷。理论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它是在总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欧、西欧所爆发的一系列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其形成的代表作就是1923年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出版。之后，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等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总结。因此，他们三人相应地被推崇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

到了30年代初期，马克思的一些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首次正式公之于世，随之在西方又掀起研究马克思的热潮，一时毁誉不一，众说纷纭。当时，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等人发表演说和文章，称这是“马克思研究中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宣布要据此重新发现和估价马克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勇斗争而威信大增；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已不止在苏联一国而在欧亚许多国家中建立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它冲破

了资产阶级的禁区,进入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界和大学课堂,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掀起了研究马克思学说的热潮。萨特曾回忆说:“1925年,当我20岁的时候,大学里不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大学生不敢在自己的毕业论文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甚至不敢提马克思主义的名称,害怕被禁止参加考试……那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教师,没有教材……”然而,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迅速传播,使“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一种世界性思潮。“马克思主义热”在西方达到高潮的标志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出现,它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主导性的作用。而以戈德曼为首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和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一翼。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围绕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及其刊物《社会研究杂志》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以及法兰克福第二代的哈贝马斯等人。法兰克福学派从一开始便直接继承了青年卢卡奇和科尔施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将其社会批判理论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他们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批判苏联模式和“正统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或重建马克思主义。

在法国,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相当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及流派,如戈德曼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等人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

在意大利,则出现了以德拉·沃尔佩和他的学生科莱蒂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德拉·沃尔佩既反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反对从卢卡奇、科尔施到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或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同现代科学的逻辑统一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科学化。

除了上述的人物及流派之外,另一个流派是所谓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流派的开创者是奥地利的赖希,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人也被人们列入这个流派之中。这个流派的首要特征是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补充”、“修正”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研究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问题,特别是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苏联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末形成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潮。该思潮包括原东德布洛赫的“乌托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彼得洛维奇等人代表的南斯拉夫“实践派”,以科拉科夫斯基等人代表的“波兰哲学人文学派”,以科西克等人代表的“捷克存在人类学派”,以黑格杜斯等人代

表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在与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冲突中发展起来的,而且也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致力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重视对社会主义问题、异化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研究。

西方的“马克思热”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达到了高潮。民主德国曾组织学者对此作了专门考察,报告描述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名字脍炙人口……这原是不足为奇的……”“看来令人奇怪的倒是,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精神生活中,尤其是近年来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生平和著作的研究占据了不小的地盘”。“在报纸文章、学术刊物以及广播和电视中,确实可以说无日不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他们的学说。同时,年轻的工人、大中学生和马克思主义团体内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探讨他们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问题。大学生们要求开课讲授马克思。那些公开反共的教授们,现在自我标榜为‘马克思通’,甚至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住房里的电视荧光屏上成套播映‘马克思述评’。大资产阶级的《法兰克福总汇报》也想通过一系列的文章使它的读者知道马克思的‘思想大厦’”。在美国,“一些主要大学的课程表上几乎都有马克思主义、激进派历史和工会等课程,而这些课程在某些地方是长期被忽视或属于被禁止之列的”。“左派学者的著作大量涌现……美国最大的左派出版社——每月评论出版社的年销售额已超过40万册”。(理查森:《美国教室中的马克思主义》,载1982年1月25日《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而且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又都是一些高等学府中有影响的教授、学者。

从70年代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心由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转向英美及其他北美国家,研究主题则由哲学、文化转向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领域,并日益与西方新社会运动结合起来。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流派。在英美,出现了以柯亨等人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该学派试图将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结合起来,用现代逻辑、数学和模式工具去研究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剥削等问题,它以强调抽象原则、重视马克思主义微观基础探索和主张非教条形式研究马克思主义为特点。在北美,则出现了以W·莱易斯、阿格尔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它及时地将生态问题和生态运动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出现了以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和以米利班德等人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等。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二代代表人物相继去世,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开始逐渐减弱,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如施密特、

哈贝马斯等虽力图高举“新马克思主义”大旗,但其影响却远不如从前了。

以上大体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彰显的历史结构及其逻辑。作为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见长的裴德海博士能够自觉涉足“西马”研究这是必然的,而现在又作出如此成绩,的确令人高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具有普及性和引导性,全书观点正确,持论科学,并能将哲学语汇平实化更属不易。是为序。

(林源: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专家、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录

导语	1
第一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界说	9
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指认	9
第二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	12
第三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形态	16
第二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生成	19
第一节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初始逻辑	19
第二节 重建历史辩证法	20
第三节 总体性范畴的置立	31
第四节 实践哲学的构建	37
第三章 法兰克福学派与社会批判理论的崛起	44
第一节 从传统理论到社会批判理论	44
第二节 社会批判理论的阐扬	49
第三节 社会批判理论主题的深化	55
第四章 霍克海默与工业文明批判	59
第一节 工业文明批判理论的确立	59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与工业文明批判理论	61
第三节 工业文明的侵害与悖逆	65
第五章 阿多诺与瓦解的逻辑	70
第一节 无调哲学的出场	70
第二节 否定辩证法的“瓦解逻辑”	71

第三节	文化工业的否定逻辑	80
第六章	哈贝马斯与社会交往理论	88
第一节	交往行为理论的弥合	88
第二节	再造历史唯物主义	90
第三节	晚期资本主义的异质性	96
第四节	交往行为理论的自觉	101
第七章	存在主义与补充马克思主义	110
第一节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架构	110
第二节	萨特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人的在场	113
第八章	马尔库塞与非压抑性文明的演进	121
第一节	非压抑性文明论的创立	12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与辩证批判社会理论	123
第三节	非压抑性文明论的生成	126
第九章	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主义	136
第一节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性	136
第二节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解蔽	139
第十章	列斐伏尔与日常生活批判	150
第一节	消费社会概念总体存在	152
第二节	日常生活的异化成为现代性的主导征候	153
第三节	消费社会批判的两种版本比较	161
第四节	两种日常生活批判思路的预设	166
第十一章	新实证主义与重释马克思	171
第一节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前置	171
第二节	德拉·沃尔佩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呈现	173
第三节	科莱蒂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范式置换	178
第十二章	阿尔都塞与保卫马克思	182

目 录

第一节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语境·····	182
第二节	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隐性结构·····	184
第十三章	“新马克思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	188
第一节	“新马克思主义”生成及分化·····	188
第二节	“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渊源·····	191
第三节	“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向度·····	198
第四节	用当代西方哲学补充马克思主义·····	204
第十四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走向·····	208
第一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出场·····	208
第二节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向度·····	216
第三节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结构·····	220
第四节	后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依赖·····	222
	主要参考文献·····	224
	后记·····	229

导 语

“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或“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是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思潮,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它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作为一种自称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为方向的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宽阔,几乎涉及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领域。它不仅关心纯哲学问题,而且更关注社会政治理论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初是由20年代初期匈牙利、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的某些观点及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及策略提出批评而兴起,继而在20年代中期以后,由西方学者加以理论的展开而逐步成长成为一种广泛的世界性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有特定的内涵,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有一些基本流派及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某些共同的理论倾向或基本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是两个相近的、但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在国内外学术界,人们有时将它们当作同义词来加以使用,有时则当作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与特征,更好地明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研究范围,有必要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源流作一简要的考察。

从现有的文献看,最早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不是别人,正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的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他在1930年所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概念,他在本文中两次提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并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或“苏联马克思主义”明确地对立起来。他说,围绕“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是一场有关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状况的基本争论已经开始,而争论的双方又分别是以考茨基的旧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和新的俄国的“列宁主义”正统派的联盟为一方,而以当代无产阶级运动中所有批判的、进步的理论趋向为另一方。前者是“新老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列宁主义或苏联马克思主义),后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欧马克思主义”或“西方共产主义”。这两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

路线上是根本对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黑格尔思想的溯源性、辩证法的革命批判性和主观意识革命或总体性革命的重要性;而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则使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化、自然主义化,使辩证法变成了旧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忽视了意识的能动创造作用。1955年,“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写了一本名为《辩证法的历险》的书,其中有一章专门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他明确地将卢卡奇(George Lukacs)和科尔施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将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称为“西方共产主义的圣经”;认为此书与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复活了革命的青春和马克思主义的青春”。他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内容及特征归结为如下四个方面:①突出主体能动作用的主体客体辩证法及其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对立;②为意识和意识形态恢复地位的“意识形态理论”;③把阶级意识等同于实践的“实践哲学”;④注重偶然性的“历史相对主义”。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因为列宁主义在哲学上是一种独断论、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在政治上则是一种极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与列宁主义的激烈对抗中产生,没有对列宁主义的批判就不能形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尽管卢卡奇本人对梅洛·庞蒂所确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存在并把他奉为这一思潮的开山祖一再提出抗议,说这是一种阴谋和伪造,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由于梅洛·庞蒂的这本书而逐步流行起来。

英国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并从形式的转移和主题的创新等方面去规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存在种种的分歧和对立,却仍然构成一种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他将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本雅明、霍克海默、德拉·沃尔佩、马尔库塞、列斐伏尔、阿多诺、萨特、戈德曼、阿尔都塞、科莱蒂等人都列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名单里。安德森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有它的独特性,使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传统且具有明确的定义和区分的界线。西方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这种脱离产生了它的另一个特点,即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哲学。他还指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群众实践之间相互统一的破裂,造成了两者之间应有的联系纽带不可避免地转向另一轴心,由于缺乏一个革命的阶级运动的磁极,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指针不断摆向当代资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无产阶级实践的关系,却微妙地被马克思主义同资产

阶级理论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所取代。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本·阿格尔(Ben Agger)则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消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地域上的含义。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有别的,赋有特定意识形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不管它来自于何方(东方或西方),只要具有这些意识形态的特征,都可以包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名称之下来加以研究。他说过在 1920 年后的一段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置身于第二国际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控制的第三国际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之间。他们试图捍卫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和拯救马克思的辩证法;他们认为,这种辩证法既保持了理论分析的客观——科学性,又保持了它的主观——哲学性。阿格尔把东欧“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或“东欧修正主义”)、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和一些并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理论家(如“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者”恩卓·佩奇、保罗·比康等)列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之中,该书用了大量篇幅摘录了 30 多位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典型言论。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接近于后来许多学者所使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许多学者则使用“新马克思主义”概念,并将它等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两者交替使用。如 R·戈尔曼(Robert A. Gorman)在《新马克思主义》一书, E·霍布斯(E. Hobbes)在《马克思主义史》一书中就采用了这种用法。他们强调,凡是超越第二国际的科学社会主义、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及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管它出现在东方,还是出现在西方,均可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戈尔曼在他主编的《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词典》中介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竟达 205 位之多。他声称这份人物名单是经过和世界上每一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长时间的反复磋商之后产生的,而且他们仅仅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而已。因此,入选者的数目可以很容易成倍地增加,就看从哪里划线。很明显,戈尔曼等人的“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包容十分广泛的概念,它所包括的人物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很不相同,有些人甚至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少共同之处。

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时也被人们当作一个单纯的地域性概念,即把它理解为西方或西欧的马克思主义。例如南斯拉夫学者 A·格尔科奇科夫在 1983 年 10 月举行的世界社会主义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东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东方马克思主义”即是指原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

义”指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指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

显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对它的内涵及外延的规定差距甚大。科尔施、梅洛·庞蒂及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原初意义上的、较为严格的概念，它既包含地域上的内涵，即主要起源和发展于西方，又强调它的思想路线上的内涵，即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对立这一基本特征。阿格尔、戈尔曼等人则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外延，将它等同于“新马克思主义”，既消除了它的地域上的内涵，又消除了它与列宁主义对立的突出特征，而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地域概念，则使这一概念失去了它的特定的含义。因此，我们倾向于从科尔施、梅洛·庞蒂等人的较严格的意义上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把它理解为包括一些特定的代表人物及流派的一种思潮；而将“新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个上位概念，在外延上既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东欧“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学”等。当然，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究竟包含哪些流派和人物，在国内外学术界也存在很大的争议，甚至许多被列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名单的人物也不承认自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迄今为止，西方马克思主义已有 70 余年的历史，它经历了从形成、发展到鼎盛及解体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及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于 20 年代初期，它的诞生以 1923 年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问世为标志。因此，卢卡奇、科尔施（还有葛兰西）相应地被推崇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

青年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极端重要性，强调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方法论的革新和扩展来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批判性。围绕这一中心，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基础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新的解释。他以黑格尔主义的精神来更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并将总体性范畴放在辩证法的中心地位，又将总体性解释为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进而考察实践概念。他断言，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只是一个社会范畴，辩证法只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而马克思主义则仅仅是一种社会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由此他批评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他力图体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考察物化和阶级意识问题，强调主观意识（无产阶级意识）在创造历史中的巨大作用。

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显示出了与《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相似的理论倾向，它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科尔施宣称本文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其方法是利用黑格尔和马克思分析历史时所采用的辩证观点来分析整个上层建筑问题,以便达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相互关系的原则性和明确性。他认为必须既反对脱离实践的理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又反对脱离理论的实践——修正主义。科尔施宣称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是同一个东西,主张通过黑格尔哲学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给马克思主义重新确定方向。他也特别强调总体性观点和主观意识的创造作用,反对唯物主义反映论。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观点更复杂一些。尽管他的不少观点与卢卡奇和科尔施的观点有较大的差别,但他的基本思想倾向与他们有一致之处。这也正是他被推崇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的主要原因。葛兰西也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独特的解释,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唯物主义一元论,也不是唯心主义一元论,而是“实践一元论”或“实践哲学”;他将实践理解为物质和精神、人和自然的统一体,主张用“合理的辩证法”概念取代“唯物辩证法”概念。他不同意卢卡奇和科尔施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批评,但并不反对他们将辩证法局限于历史领域的观点。葛兰西还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重大意义,批判第二国际的机械论和宿命论观点。

由此可见,卢卡奇、科尔施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一种既不同于恩格斯、列宁等人所阐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又不同于以伯恩斯坦等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观点的解释,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传统,确立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现和设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向。

2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传播,并与这些国家的社会文化传统尤其是流行的哲学思潮相结合,出现了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流派,从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一种世界性思潮。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70年代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通过60年代末“新左派”及学生造反运动,特别是法国的“五月风暴”,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声名大振,但也立即走下坡路,尽管他们的理论在某些方面得到修正和补充,但大势已去。另一方面,7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心转变,在英美及其他北美国家,出现了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流派及代表人物,研究的主题、范围也发生了变化。

首先,先前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流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和后起之秀,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以及总结“新左派”造反运动的经验教训,修正或推进各自所属流派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马尔库塞,在“五月风暴”之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加以重新分析,修正他的发达工业社会理论及政治策略;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后则力图用语言学去补充和修正早期的批判理论,实现批判理论由意识哲学到语言哲学的转向,并加强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列斐伏尔则通过对发生在他身边的“五月风暴”的分析和反思,进一步扩展了“异化——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特别致力于国家理论的研究,将这方面的研究与异化理论的研究并列,作为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整体性的两条主线。沿着“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A·高兹(A. Gorz)把“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运动、后工业社会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政治生态学”、“后工业社会主义”等理论,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80年代在法国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活动领域。沿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向,N·普兰查斯(N. Poulantzas)则以提供“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国家学说而闻名于世。

其次,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心由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转向英、美及其他北美国家,研究主题则由哲学文化转向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领域,并日益与西方新社会运动结合起来。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流派。在英、美,出现了以G·A·柯亨(Gerald Allan Cohen)、J·埃尔斯特(John Elster)、J·E·罗默(John E. Roemer)等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北美,则出现了以W·莱易斯(William Leiss)、B·阿格尔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它及时地将生态问题和生态运动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还出现了以伊曼纽尔·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和以R·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R·奥德纳(James R. O'Connor)等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此外,在意大利出现了S·丁伯纳罗(Sebastiano Timpanaro)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法国80年代以来则有以乔治·拉比卡为代表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

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末形成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潮。该思潮包括东德E·布洛赫(Ernst Bloch)的“乌托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G·彼得洛维奇(Gajo Petrovic)、M·马尔科维奇(Mihilo Markovic)、P·弗兰尼茨基(Predrag Vranicki)等人代表的南斯拉夫“实践派”,以L·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A·沙夫(Adam Schaff)等人代表的“波兰